

日本殖民主義與台灣、朝鮮的解殖暴力

魏龍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本文旨在探討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與台灣，在二戰後解殖歷程中集體暴力的顯著差異：1945年日本投降後，朝鮮立即爆發針對殖民者與本地協力者（如親日地主、警察）的大規模殘酷暴力，並延續至美軍政時期的大邱事件。反觀台灣則呈現相對和平的狀態，對協力者的清算僅止於言詞批判；即使是二二八事件，衝突焦點亦是針對新政權，而非內部清算。為解釋此差異，本文提出涵蓋戰前與戰後因素的分析框架。戰前因素假設：一、朝鮮遭受更嚴重的「經濟壓迫」，導致階級矛盾深化；二、朝鮮存在更多且更高層級的「政治吸納」協力者，使其成為直接的報復對象。戰後因素假設：朝鮮北部政權積極清算協力者，南部政權則高度仰賴協力者，兩者皆催化了暴力；而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建構模式不同，轉移了社會矛盾的焦點。本文藉由比較兩地經驗，揭示此歷史謎題，並為後續研究勾勒分析路徑。

關鍵詞：解殖、集體暴力、協力者、日本殖民主義

《台灣社會學》第50期（2025年12月），頁47-82

收稿：2024年12月1日；接受：2025年8月21日

* 通訊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社會所

Email: weilungta@gmail.com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Decolonizing Violence in Taiwan and Korea

Lungta Wei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ignificant divergence in collective violence between the former Japanese colonies of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ir post-World War II decolonization process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Korea experienced an eruption of large-scale, brutal violence targeting colonizers and their local collaborators such as pro-Japanese landlords and police, which continued into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period, as exemplified by the Daegu Uprising. In contrast, Taiwan exhibited a relatively peaceful transition, where the reckoning with collaborators was confined to rhetorical condemnation. Even during the 228 Incident, the focus of the conflict was directed at the new regime rather than internal reckoning. To explain this dispar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both pre-war and post-war factors. The hypothesized pre-war factors are: first, that Korea suffered from more severe economic oppression, which intensified class conflict; and second, that Korea had a greater number of politically co-opted collaborators at higher levels, making them direct targets for retaliation. The hypotheses regarding post-war factors are: that in Korea, the northern regime actively purged collaborators while the southern regime heavily relied on them, both dynamics catalyzing violence; whereas in Taiwan, the Kuomintang regime's model of state-building shifted the focus of social conflict toward the newly arrived state apparatu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two cas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shed light on this historical puzzle and delineate analytical pathway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decolonization, collective violence, collaborator, Japanese colonialism

一、研究背景：全球解殖的集體暴力

1945年，對於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就國際政治的面向來看，1945年之後的三十年間，雖然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帝國極力維持其殖民勢力，¹ 亞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殖民地民族主義依舊使得歐洲帝國逐漸瓦解。在非洲，大多數殖民地都於1960年代脫離歐洲統治成為獨立國家（Stapleton 2018: 65）。在亞洲，越南、柬埔寨、印度等殖民地，也陸續脫離法國與英國的殖民統治。過去多民族的帝國與殖民體系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秩序。帝國瓦解與民族國家成立，是二戰之後最重要的歷史過程之一，乃至數十年後的今天，全世界依舊處於1945年前後形塑出的地緣政治格局當中。帝國瓦解、建構民族國家、清算殖民遺緒，再加上稍後逐漸浮現的美蘇冷戰格局，² 使得1945年成為當代歷史的起點。Ian Buruma（2013 / 白舜羽譯 2017）以「零年」來界定1945年這個關鍵的時刻，探討二戰結束之後全球各地眾多行動與事件的交織與辯證，如何形塑出存續至今的當代秩序。

1945年後各種政治制度劇烈變遷，從殖民地到民族國家的解殖過程即是相當關鍵的一項政治轉型。³ Prasenjit Duara（2003: 2）對於解殖提出的定義為「殖民列強將其對領土和附屬地的制度和法律控制權移交給具有本土基礎與正式主權的民族國家……解殖不僅代表法律主權的轉移，還是一場為道德正義和反帝國主義政治團結的運

1 二戰結束之後，許多歐洲帝國官員都以為殖民體制依舊能夠長期維持，但卻出乎意料遭到殖民地強烈反抗（Betts 2012: 25-26）。

2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發表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咨文，而美國國會隨後決定資助希臘與土耳其壓制其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杜魯門主義標誌美蘇之間冷戰的起點（林孝庭 2015: 11）。

3 David Gardinier（1968: 268-269）指出解殖是1950年代廣泛使用的概念，描述非洲與亞洲在二戰之後脫離殖民統治的過程。原先僅指涉政治獨立，但是後來擴展到經濟、文化、心理等各種層面對於外部控制與剝削的排除。

動」。正由於解殖涉及反帝國主義的道德價值與政治團結，如何處置殖民者與協力者成為爭議所在，許多地區的解殖過程出現嚴重的集體暴力。⁴ 首先，為了脫離帝國與殖民者，二戰結束不久即爆發印尼獨立戰爭（1945 年）、印度支那戰爭（1946 年）、印巴分治（1947 年）、茅茅起義（1952 年）、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 年）等。其次，前殖民地大都頗為激進，⁵ 急於清算與殖民者協力配合的叛徒，法國帝國所屬的越南與阿爾及利亞就顯現出這樣的衝突。越南人對於法國與越南的混血兒充滿仇恨，1945 年 9 月西貢有數十名混血兒遭到綁架。少數被救出來的倖存者描述受害者在被囚期間遭遇了「難以置信的虐待」，受害者中包括一位懷孕八個月的年輕女子，據稱她「被反覆強暴、遭到剖腹，胎兒被當作足球踢，並在極其殘酷的方式下被殺害」，據說還有吃人肉的事情發生（Thomas and Asselin 2022: 526-527）。在阿爾及利亞也出現社會內部的暴力，民族解放陣線對於其他同樣主張獨立的組織採取暴力，1957 年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殺害了數千名其他組織的支持者（Thomas and Asselin 2022: 532）。

一名前法國殖民地官員以「火山熔岩爆發」形容殖民地獨立運動，將解殖描述為「一種從深層原因積累起來並且不受控制而爆發至國際舞台的力量」。此外，許多政治人物與學者也以隱喻強調解殖受到無可避免的力量推動，人為干預無法阻擋（Betts 2012: 23-25）。面對上述時代巨變，Frantz Fanon 指出，「正如我們所見，被殖民的大

4 晚近許多研究都以「暴力終結」、「大屠殺」描述帝國瓦解與解殖過程，例如 Ronald H. Spector (2022)、Thijs Brocades Zaalberg and Bart Lutikhuis (2022)。

5 佔領地亦有類似現象，例如法國雷諾汽車的創始人，就因為曾經被迫為納粹製造汽車，公開受審之前就遭左派施暴而死在獄中（Buruma 2013 / 白舜羽譯 2017: 263-264）。在義大利，曾經與墨索里尼合作的大企業，如飛雅特，也成為共產黨游擊隊攻擊的目標。1945 年 4 月到 7 月之間，「義大利北方可能有兩萬起處決法西斯和通敵者的案例……許多人是遭共產黨主導的游擊隊就地處決，有些則在臨時設立的人民法院草草受審，也就是所謂『廣場的正義』，而處決非常迅速，有時會濫殺無辜」（Buruma 2013 / 白舜羽譯 2017: 147-148）。「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後的法國，不分男女，各式各樣的人都受到整肅，有時手段相當殘暴。約有四千人喪生，其中許多人被控叛國罪，其他人則因私人恩怨或政治因素（如阻撓共產黨）而遭整肅」（Buruma 2013 / 白舜羽譯 2017: 126）。

眾直覺地認為，他們的解放必須並且只能通過武力來實現」，並斷言「解殖永遠是一種暴力的現象」（Fanon 1963: 65, 95）。⁶更進一步來說，解殖暴力並非偶發的無序行為，而是反映並重塑社會關係與歷史脈絡。Fanon 主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暴力關係具結構性根源，殖民者施加的心理創傷與貶抑只能透過暴力加以淨化，讓被殖民者擺脫自卑與絕望，恢復自尊；盧安達大屠殺的關鍵原因在於殖民時期的種族分類與間接統治政策，強化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身分矛盾和權力不平等（Mamdani 2001）。此外，當群體經歷過大規模暴行並透過敘事建立集體意義，就會重塑該群體的自我認知以及與他者的關係（Alexander et al. 2004）。

二、經驗發現與議題開發： 戰後朝鮮與台灣的解殖暴力差異

在全球各帝國與殖民主義瓦解的浪潮中，已經逐漸成為日本帝國與大和民族一部分的朝鮮和台灣，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劇變，在二戰結束之後卻出現相當不同的政治局勢。如同其他前殖民地，1945年8月以降朝鮮充滿各種暴力行動，戰後初期的朝鮮動盪不安。美軍登陸朝鮮之際，以佔領軍的姿態與嚴厲的口吻，宣布〈太平洋美國陸軍總司令部布告〉（森田芳夫 1964: 247-248）。後來深感態勢危急，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以下簡稱美軍政）在向國務院提出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朝鮮南部可被形容為一個火星即可引起爆炸的火藥

6 這個斷言不只是經驗描述，也是行動綱領。受到 Georges Sorel 的影響，Fanon 認為暴力具有清除殖民經驗的淨化作用，被壓迫者在抵抗過程中重生，獲得過去遭殖民者剝奪的權威與尊嚴（Betts 2012: 27-28）。此外，由於殖民主義本質上是暴力的，被殖民者也必須使用暴力才能達成真正的解殖（Ndayisenga 2022: 481-482）。Messay Kebede（2001: 539）指出 Fanon 「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基於殖民壓迫特殊情境的正當暴力。他認為殖民主義在質上不同於以往的征服和支配形式，並主張使用暴力的理由超越了自我防衛或清除腐朽社會體系的必要性。他視暴力為治療由殖民壓迫所引發的文化病的必要手段。僅僅讓殖民者離開是不夠的；除非被殖民者參與暴力行動，否則無法真正恢復解放與尊嚴」。

桶」(曹中屏等 2005: 22)。在這個火藥桶當中，不僅人民對日本殖民者暴力相向，也持續存在社會內部的對立與衝突。反之，戰後台灣的情況相當不同，日本天皇以廣播宣布投降之後到行政長官陳儀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間的七十一天，台灣社會處於相對和平而少有激烈紛爭的狀態。無論對於殖民者或協力者，都未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就如同吳濁流的描述，台灣社會呈現一個政治真空的平靜狀態。即使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矛盾僅存在於外來者與本地社會之間，並未出現針對殖民協力者的清算。

清算殖民遺緒的社會內部衝突，勢必重新塑造各國內部的社會關係，影響深遠，德國歷史學家 Jürgen Osterhammel 與 Dietmar Rothermund 認為解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過程，⁷形塑各地的變遷軌跡 (Rothermund 1998 / 朱章才譯 2000: 13-14; Osterhammel and Jansen 2013 / 傅熙理譯 2019: 14)。此外，解殖的研究經常提出比較性的問題，例如：「去殖民動能為何在特定的時間點發動？為什麼有些去殖民動力擺脫了殖民強權，有些強權則（剛好相反）能夠（共同）創造動力？為什麼有些進程較為暴力、有些則較為和平？為什麼有些過程會帶來特定形式（種族、宗教、社會）的衝突？」(Osterhammel and Jansen 2013 / 傅熙理譯 2019: 31-37)。台灣與朝鮮的解殖暴力差異可以在這個學術脈絡當中加以探討。

(一) 集體暴力的朝鮮

1. 日本帝國投降之際：出現大規模暴力行動

1945 年 8 月 6 日與 9 日，美國以原子彈攻擊廣島與長崎。9 日，蘇聯軍隊進攻朝鮮半島。在昭和天皇投降之前，朝鮮總督阿部信行就預見朝鮮極可能動盪不安，因此相當積極地與朝鮮菁英接觸，希望

7 Gifford and Louis (1982: vii) 亦指出：「解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主題之一。無論是透過暴力還是談判，殖民帝國的消逝在二戰後消耗了亞洲與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治能量。」

宋鎮禹代表的右派能夠協助維持秩序。⁸ 在右派菁英不願意配合的情況下，朝鮮總督府又求助於左派菁英。呂運亨於 14 日與阿部信行會面，⁹ 同意協助維持治安（森田芳夫 1964: 67-72）。15 日晚上，呂運亨成立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隔日下午，建國準備委員會透過漢城廣播電台發表〈告海內外三千萬同胞書〉，宣布建國準備委員會的任務包括：「建立警備隊與國家正規軍維持治安，釋放政治犯為建國集結一切民族力量，管理交通、通信、金融，穩定物價與保證糧食供給，號召全體人民保持秩序，保護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曹中屏等 2005: 6-8）。雖然朝鮮總督府迅速尋求協助，但是社會仍在瞬間失控，爆發針對殖民者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成為朝鮮半島與全球各地解殖過程的共通之處。群眾無視朝鮮總督府關於維持治安的警告，出現各種暴動，挑戰總督府的權威。僅 8 月 16 日至 25 日十天之間，就出現襲擊或接收警察局事件 149 起；搶奪槍砲彈藥 41 起；毆打威脅日本警察 66 起；毆打威脅朝鮮警察 111 起；毆打威脅朝鮮人公務員 109 起；破壞焚燒日本神社 136 起（森田芳夫 1964: 247-248）。朝鮮人燒毀神社使得日本人相當恐慌：

一些人來到離他們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廟拿著榔頭、棍棒，甚至只是揮舞拳頭，試圖砸毀這個殖民壓迫的主要象徵，最後再放火燒毀。縱火事件一開始發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繼而有蔓延全國之勢。這些備受憎惡的廟宇徹夜燃燒、火光沖天，視神廟為聖地的日本人大為驚恐。（Buruma 2013 / 白

8 宋鎮禹 1887 年出生，1918 年與金性洙、玄相允、崔麟、崔南善等人促成三一運動。1921 至 1940 年歷任《東亞日報》社長、顧問、主筆等職。1945 年 8 月 11 日，日本總督府向宋鎮禹提出解放後治安權委託等建議，他依據局勢判斷拒絕，隨後總督府與呂運亨接觸。1945 年 12 月 30 日遭襲擊身亡。宋鎮禹相關生平事蹟，見김영석 (2024)。

9 呂運亨 1886 年出生，1920 年加入高麗共產黨並於 1922 年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由於預見日本即將戰敗，於 1944 年成立朝鮮建國同盟並擔任委員長，並與延安的朝鮮獨立同盟合作，謀劃聯合作戰。1945 年光復後，主導成立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並擔任委員長。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解散後成立朝鮮人民共和國，擔任副主席，並與金九、李承晚、安在鴻、宋鎮禹等討論建國方案。1947 年 7 月 19 日在首爾遭槍擊身亡。呂運亨相關生平事蹟，見김삼웅 (2015)。

舜羽譯 2017: 330-331)

這個時期的暴力行動有幾點特徵，包括：攻擊警察局與行政機關、破壞日本神社、朝鮮受害者比日本人更多。這些並非有組織的行動，積怨已深而突然爆發的行動，反映朝鮮人的內心情緒。殖民末期的戰時體制下，許多朝鮮人積極配合日本帝國政策協助徵召同胞赴海外軍需工廠、煤礦場、戰場而遭到仇視。因此戰後初期暴力的對象不只針對日本統治者，還包括戰爭時期徵收物資與勞工的協力者。換言之，群眾的憤怒並非只針對遙不可及的日本高層，也指向那些直接執行壓迫政策的同胞（이연식 2012: 25-26）。

戰後初期解殖暴力主要針對三類朝鮮協力者：第一，親日地主階級。日本當局為鞏固統治，在殖民初期便與朝鮮地主妥協，保全其土地財產及舊有特權，以換取地主協助鎮壓農民抗暴、監控民族主義者。這導致農村貧富更懸殊，地主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仍多享富足生活，而廣大佃農則陷於苛徵暴斂、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累積已久的階級仇恨在殖民統治結束後爆發，一些地方出現佃農子弟追打地主子弟的場景，昔日受欺凌的農民後代親手教訓地主後代。第二，地方基層領導人。在日軍推行戰時總動員時，許多地方仕紳賣力宣傳日本皇國戰爭目標，協助殖民政府徵用人力物力，甚至替日軍強徵慰安婦。民眾對這些人極為仇恨，戰後迅速洗劫他們的住宅並縱火焚毀，及時逃跑的仕紳得以倖免，來不及逃的則遭群眾抓獲處決。第三，殖民地朝鮮警察。這些警察與地主合作徵收稻米、鎮壓抗爭，對農民動輒掌摑鞭打，甚至虛報配額以從中牟利。民眾稍有違規即遭當眾笞打、拘押入獄，濫權酷刑司空見慣。由於朝鮮警察是殖民統治的直接執行者且無處不在，朝鮮百姓對其恨之入骨。戰後群眾立刻對警察展開報復性毆打，許多朝鮮警員被趕出城鎮、狼狽逃命（Chang 2025: 11-12, 26-2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當天，呂運亨宣布成立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兩天後公布中央組織，由呂運亨任委員長、安在

鴻任副委員長，以平衡左右各派勢力。¹⁰ 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八月已在朝鮮半島全境設立了 145 個分支機構，九月初即改組為朝鮮人民共和國，其地方分支機構能夠延伸到村莊層級，組織社會群體、維持公共秩序，甚至接管日本殖民者的土地與財產。這個戰後朝鮮人民自主成立的左翼準政權組織對於過去的協力者抱持拒斥立場，堅持清算社會內部敵人，¹¹ 一方面沒收其財產，另一方面剝奪其投票權。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綱領包括：一、清除日本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施行真正的民主；二、立刻廢除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法律制度；三、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叛徒的土地，無償分配給農民；四、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叛徒的工廠、礦山、鐵路、港口、船舶、油電以及其他設備，實行國有化；五、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 14 歲以下的兒童從事勞動，對 18 歲以下的少年實行六小時工作制。此外，朝鮮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呂運亨發表演說：「我們決心摧毀國內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殘餘影響、反民主的派系、反動分子，以及任何不受歡迎的外國勢力。我們要建立完全的自主與獨立，並期待實現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Cumings 1981: 88）。這些政策綱領與演說內容顯示，曾經與日本殖民體制配合的協力者被視為民族叛徒，在戰後初期國家形成之際被排除在共同體成員的資格之外，喪失政治社群當中的經濟與政治權利（Kang 2011: 330-332）。

10 安在鴻（1891-1965），日治時期曾任《朝鮮日報》社長、新幹會總務幹事等職務。1937 至 1944 年間研究朝鮮上古史及朝鮮哲學，以期克服日本學者之殖民史觀。1945 年 8 月 15 日光復後任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副委員長，但委員會受到共產主義者主導後，於同年 9 月獨自建立政黨並擔任主席。安在鴻的生平事蹟，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2005）。呂運亨於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成立之初極力尋求左右勢力合作然而最終失敗，이근태（2006）主張失敗原因在於右派宋鎮禹堅持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才是唯一正當的政府，윤덕영（2010）則認為朴憲永派別的共產主義者試圖奪權並排斥右派人士才是失敗關鍵。

11 許多歷史學者指出，與歐洲的脈絡不同，東亞的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見 Andrei Lankov（2013: 5-6）。Bruce Cumings（1981: 86）亦認為朝鮮的左右之分，在於 1920 年代以降三個面向的路線差異：一、是否極力根除日本的影響，即使是正面的部分；二、是否從事群眾動員並追求社會平等；三、是否承諾去除朝鮮的封建遺緒（封建意指資本分配嚴重不均，特別是土地）。

2. 美軍政時期：針對協力者的大邱事件

朝鮮社會解殖過程中的暴力與衝突持續不斷，在日本殖民者受遣返回國之後，針對協力者的清洗依舊存在。既有研究指出，美軍政統治朝鮮南部的三年之間（1945 年 9 月至 1948 年 8 月）由於政策失當造成朝鮮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動盪。對於朝鮮人民而言，美軍從一開始的解放者轉變成壓迫者，但是 602 件抗爭事件當中針對美軍政的只有 11 件，卻有 349 件是攻擊日本人、親日派與官僚（이혜숙 1988: 231）。

1946 年 9 月，在美軍政統治時期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的背景之下，由首爾¹²與釜山總計近萬名的工人要求加薪與實物配給開始，全國各地出現勞工運動，九月底有二十五萬名工人參與總罷工。十月大邱成為抗議中心，警方鎮壓迫使群眾佔領警察局並攻擊警察與官員，之後抗爭繼續擴散到慶尚南道與慶尚北道三十多個城鎮。據估計，超過兩百萬名群眾參與罷工與抗爭活動，過程中有超過兩百名警察與超過一千名抗爭者傷亡（Kang 2011: 330-332；김승식 1947: 257-258；Shin 1994: 1606）。¹³事件爆發之後，朝鮮各政治勢力認為發生大邱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對安插在警察及行政機關和事業機構的親日派、民族叛逆者和各類獻媚者的行為的極度憎恨」（曹中屏等 2005: 62）。既有研究指出起因包括美軍政壓迫、經濟動盪、共黨組織群眾等面向。大邱事件是後殖民社會面對外來統治政策失當而興起的抗爭，但是群眾抗爭的主要對象並非外來的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Kang 2011: 338）。一位美國目擊者表示：「令人驚訝的是，儘管我們積極參與，但沒有一個美國人受到傷害。……他們只是在與那些在我們統治下壓迫他們的人和力量算帳，就像他們在日本統治下所

12 「首爾」一詞是 2005 年為韓語固有詞彙서울創設的中文譯名，以解決漢字文化圈對於서울（Seoul）與한성（Hansung）一律翻譯為「漢城」而造成的混淆。서울在朝鮮王朝與日本殖民時期曾經存在漢陽、漢城、서울、京城等名稱，1946 年美軍政頒佈 Charter of the City of Seoul，正式將京城府更名為서울市。相關討論，見임동석（2007）、강석경（2018）。

13 也有學者估計全國約有三百萬人參加，抗爭除了南方的慶尚道、全羅道地區，還擴散到首爾以東的江原道，見강만길（2015: 271, 481）。

做的那樣」（Gayn 1989: 350, 388-89）。

群眾對於先後為日本與美國效力的協力者充滿怨恨。一位見證者近年受訪時表示：

在我下班的路上，我看到街上堆滿了很多東西，周圍有很多人。那是一位在日本殖民時期失去民心的高級政府官員的房子。他們搜查了他的房子，發現了很多米、糖和棉布。這些東西在當時非常珍貴。人們沒有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而是把它們放在街上，喊著「看看這些，現在人們衣不蔽體，飢寒交迫，這個王八蛋卻活得這麼好，對抗人民」。他們咒罵他，喊著他應該被打死。（Kang 2011: 321-322）

仇恨不只針對高官，也針對地方行政官僚，一位曾經參與大邱抗爭的勞工運動家回憶，一位鄉長在殖民時期讓自己認識的人免於強制徵兵，卻強迫其他人入伍以提升自己的考績。戰後鄉長遭到村民毆打「人們用鑊子打他的頭，然後把他扔進稻田。我們以為他死了。但是，他又出現在鎮上，並被美軍政重新任命。後來，在起義期間，人們再次襲擊了他」。換言之，過去的仇日情緒延續到戰後，群眾對於日本與美國的協力者充滿敵意（Kang 2011: 340）。

群眾咒罵與毆打朝鮮官員，並且極為仇視朝鮮警察。美軍政官員對此有所認知，對記者表示：「我們現在用來治理朝鮮的人是那些愉快地為日本做骯髒工作的右派分子。現在的朝鮮警察部隊中有些人實際上因其在鎮壓朝鮮民族主義中的殘忍和高效而被日本人授予獎章」（Gayn 1989: 353）。這樣的仇恨帶來極端行為，10月6日在大邱有三十八名警察遭到殘酷虐殺，包括虐待至死、燒死，甚至剝皮而死（Cumings 1981: 356）。美軍政的檔案也記載，朝鮮群眾並未攻擊任何美國官員，卻對朝鮮警察充滿仇恨而施以殘酷暴行：

在大邱，警察的臉和身體被斧頭和刀砍傷。他們的手被綁在

背後，然後被人用尖銳的石板投擲，直到他們因失血倒地，接著大石塊被砸在他們的頭上，將其壓得無法辨認。在慶尚北道的倭館邑，警察局長的眼睛和舌頭被稻刀割下，然後被打死。在尚州，五名警察被嚴重毆打並被活埋。

而群眾的仇恨來自於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協力者與群眾之間的緊張關係（Kang 2011: 338-339）。

（二）相對和平的台灣

1. 日本帝國投降之際：總督府持續控制台灣

戰爭結束之前的幾個月，台灣總督與其他官員依舊和台灣菁英維持密切互動。在日本投降之前的最後兩週，吳新榮協助日方準備地方街庄長的人事資料，並出席軍人家屬慰問活動。林獻堂則在八月初接待安藤利吉總督的拜訪，兩人談話近四十分鐘（許雪姬 2008: 163）。即使到了 8 月 15 日之後，總督府與日軍仍舊對台灣菁英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阿部賢介 2013: 122）。面對平靜無波的台灣社會，總督府對於自己維持秩序的能力很有信心。林獻堂等台灣士紳擔憂社會可能失序，主動詢問總督是否需要協助維持秩序。然而，總督回應：「日本將維持治安到接收前，治安維持會暫時可以不組」（林獻堂 2010: 250）。台灣總督的自信是相當正確的，戰後的台灣確實與朝鮮相當不同。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在九月中旬的日記記載：「中國軍隊仍未進駐台灣，一切情況極平安。或許是為了這個緣故，大家都不緊張，總督府等機關亦依然如舊，一點也看不出日本已敗戰無條件投降的跡象。」甚至因為日本本土經濟狀況不佳，而台灣狀況尚可，有些日本人希望繼續留在台灣（塩見俊二 2001: 26-31）。

由於總督府能夠維持運作且台灣相對平靜，盟軍認為從台灣遣返日本軍人與平民的工作並不像其他地區那麼迫切。負責處理解體日本帝國，將人員遣返回日本的美軍曾經在報告中指出，朝鮮的遣返充斥

暴力，只要出現日本人，就可能引發衝突。同一份報告也指出，日本帝國各種佔領區當中，台灣是遣返最和平的地區。此外，日本厚生省的出版品也有相同觀察（Watt 2009 / 黃煜文譯 2018: 50）。當時台灣報章雜誌報導遭遣返的日本人依依不捨，也有不少台灣人前往送行道別（歐素瑛 2003: 218）。

台灣的右派菁英面對已經投降的日本，仍然採取極為謹慎的態度。過去經常撰文批評總督府政策的記者黃旺成，僅低調與友人喝酒慶祝，不敢大聲喧嘩。黃旺成在日記中，提及自己耳聞辜振甫、林獻堂、林熊次與日軍參謀有行動計畫，但是黃旺成認為「處世時須冷靜」（許雪姬 2008: 169）。長年領導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全台敬重的林獻堂同樣呈現出相當謹慎的態度。戰後，許丙與藍國城旋即前往拜訪，希望與林獻堂一起去中國拜訪國民政府重要人士，林獻堂婉拒，向兩人表示「此時須慎重，不輕為之也」（林獻堂 2010: 253）。林獻堂也不願參與新成立的政治團體，先是在 8 月 23 日，對於成立「解放委員會」而前來拜訪的楊逵與李喬松，林獻堂在日記中記載自己回應：「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騷亂社會秩序也。彼等略能理解，唯唯而退」（林獻堂 2010: 253）。後來又於 10 月 1 日婉拒擔任學生聯盟顧問的邀約，並直言「此後凡所有之團體皆不欲加入」（林獻堂 2010: 314）。

戰後部分左翼行動者嘗試建立政治組織並串連群眾，例如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監視報告指出，楊逵「預測重慶軍閥之專恣暴虐，為予以牽制，從事預先鞏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近藤正己 2014: 671）。此外，謝雪紅積極活動，串連過去抗日運動的參與者。謝雪紅先與楊克煌撰寫傳發〈告台灣青年書〉，接著與林兌、謝富、李喬松等人於 10 月 5 日在台中籌組「台灣人民協會」，通過「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宣言」及「台灣人民協會章程」，並由宣傳部長李喬松到台

北、員林、竹山、南投等各地宣傳人民協會的組織宗旨。¹⁴ 然而從既有資料來看，這些行動似乎未產生太大影響，既未能動員群眾，也未推進任何政治訴求，更沒有對殖民者或協力者展開清算鬥爭。¹⁵

總督府與台灣菁英階層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且能夠壓制潛在的左翼行動者。具有抵抗經驗的菁英尚且如此，大多數群眾也戒慎恐懼。戰後初期的確出現兩百多起犯罪行為，但主要是因為戰爭晚期總督府的經濟剝削而產生針對財產的竊盜與掠奪行為，並非針對日本人的無差別攻擊（費德廉 2004: 370）。另外也曾出現台灣人以言語威脅日本人的現象，以及一名警察課長遭到暗殺的事件，但是僅零星出現於幾個地點，並未形成遍及全島的大規模集體暴力。總督府官方描述戰後初期的狀態是大多數民眾「一時杳然、不知所措」（陳翠蓮 2016）。整體而言，在台日本人處於相對安全的狀態。塩見俊二認為：「身為戰敗國國民的日本人之能在未迎接新的勝利者以前過了平安的生活，這大概是起因於對維持台灣的治安、發展產業、改善台灣人的生活等，日本人確有所貢獻，因此也不以統治者身分受到當地台灣人之怨恨或報復的緣故吧」（塩見俊二 2001: 46）。

吳濁流（1988a: 160, 1988b: 152）以「政治真空」來描繪台灣戰後的情勢，¹⁶「由於很久祖國沒有來接收的關係，政治完全成真空狀態了；於是大家又自動地在各街各庄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自動擔當各地的治安工作。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夠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晚近研究指出從戰後初期的經濟、社會與治安等各治理面向，都顯示出總督府在日本帝國投降之後依舊能夠維持社會秩序，直到行政長官公署成立。歷史學者蘇瑤

14 謝雪紅還組織了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台灣學生聯合會。楊遠與老台共李喬松也於八月底在台中地區散發解放委員會宣傳單（許芳庭 2008: 222-223；吳叡人 2016a: 47；蘇瑞鏞、林瓊華 2008: 716-717；林正慧 2008: 171）。

15 1945 年 11 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規定「台灣省人民團體必須全部停止活動接受調查，各團體經登錄後，依法進行調查，如有必要得宣布解散或重組」。隔年並依此下令解散人民協會等左翼團體，此後，左翼行動者並未重新建立組織（何義麟 2008: 585）。

16 許多相關研究都引用此一概念，例如張炎憲等（2006: 180）、陳翠蓮（2013: 212-215）。

崇如此描述戰後初期的氛圍：

這段時間，政權即將轉移之際，政治上雖充滿許多不確定，社會上瀰漫著徬徨不安、期待與等待，但卻不是一個動盪混亂的時代，這是何以中國政府能夠順利且完整的接收台灣之故。這段時期一切事務仍按照著其既有步驟與秩序進行著，若對照接收之後的腐敗、混亂與二二八事件，這段時期反而呈現出風雨前夕寧靜的狀態。（蘇瑤崇 2007: 47）

然而，兩種描述的共通之處在於都指出戰後台灣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混亂與暴動。

戰後初期對於殖民遺緒的清算主要集中於言詞，例如：批判日治協力者，重新評價左右翼的抗日運動，保存台灣語言、文化、史料，確立台灣主體性等面向。例如以陳逸松為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分團，張貼「歡迎陳儀長官蒞臺主政，要求御用紳士退場反省」的標語。《台灣新報》以〈新台灣建設與「御用紳士」問題〉為社論標題，批判御用紳士：

近來有「警告御用紳士退場反省」之標語，亦令人可以首肯。……若是被民眾公認之「御用紳士」依然以卑劣的手段，改頭換面、乘機登場而求榮者，一定要遭受民眾的一大反抗，致使破壞大同團結。所以，「警告御用紳士退場反省」之一事，這可以說是為建設台灣不能免之過程。（陳翠蓮 2016: 206-211）

此外，黃旺成也在《民報》撰文批評御用紳士：「有一種恥作台灣人、謀做日人的養子，繼獲得日籍、已經不是台灣人了。不知道這種人，有決心要和日人一塊兒歸國去的準備沒有？」（阿部賢介 2013: 139-140）。吳新榮也回憶戰後初期進步分子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

貢獻自身心力並且排斥親日協力者，「這時候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派人到台灣，所以大概進步份子和熱血青年都走到青年團來……人人都想這個時機對祖國有些奉仕（貢獻），決不使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來做投機」（吳新榮 1989: 188）。

整體而言，1945 年 9 月中，台灣社會的動向，包含「排斥日治時期與日本當局勾結之『御用紳士』，以各式手段壓抑、剝奪，避免這類人士再度於台灣社會上取得特權或保護」（阿部賢介 2013: 131）。陳翠蓮（2016: 209）指出：「戰後初期民間清算對象從日本特高、警察、台灣人走狗等殖民統治的加害者，逐漸轉向日治時期協力者御用紳士。在反日情感與是非觀念下，眾論囂囂，形成道德壓力，欲將殖民統治協力者驅逐於公共參與範疇之外。」但是，內部清算僅局限在透過報章雜誌呼籲「御用紳士知所進退」，並未出現更為嚴重的暴力衝突或是激進的政治主張。

2. 國民黨政府時期：針對外來統治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與大邱事件的暴力性質和統治結構並不相同，有必要釐清兩個事件的歷史脈絡與意義。¹⁷ 我主張第一個比較基準在於接近的歷史脈絡，1947 年 2 月的二二八事件以及 1946 年 10 月的大邱事件，共通之處在於發生在相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從 1945 年 8 月開始持續的解殖過程，以及兩者都是日本帝國剛剛瓦解而新的政權正要建立的歷史過程，過程中社會內部對於如何處理殖民者與協力者存在爭議。第二個比較基準在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制度積累以及社會整合與分裂，雖然就政權而言美軍政與國民黨的統治結構不同，但是日本殖民時期以降台灣與朝鮮長期形成的社會關係則是連續的，也具有可比較之處。¹⁸ 換言之，運用原協力者建構政權而帶來的社會後果，完全

17 感謝審查人提醒這個思考角度。

18 吳叡人（2016b: 324-325）從「政治史的斷裂與社會史的連續」以及「政權的不連續與制度的積累」分析台灣民族國家的形成經驗，深具洞見值得參考。

深植於日本殖民主義所形塑的權力關係。¹⁹ 更具體來說，同樣處於外來統治時期的解殖過程，大邱事件當中朝鮮群眾攻擊官僚、警察、地主等往日的親日協力者，但是二二八事件則未出現類似現象，本省籍的官僚、警察、地主等政治與經濟協力者並非群眾的攻擊對象。

既有研究指出，當時全台各地都出現外省人遭到攻擊的案例：

請願民眾因長官公署開槍掃射而四散奔逃之後，憤怒情緒被刺激到最高點，省籍矛盾在狂亂中全面展現。逃離公署前廣場的民眾並未散去，反而分據各交通要道、公共場所、旅館商店，只要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莫不以拳腳相向或棍棒交加……外省人經營的公司也成為洩恨的目標……。（陳翠蓮 1995: 146）

而當時區辨是否為外省人的方法，則是測試是否會說台語與日語，以及是否會唱日本國歌（許毓良 2018: 141）。當然，不是所有外省人都遭到本省人攻擊，也有記者指出群眾僅針對貪污腐敗的外省官員洩憤，也有親歷其事的人指出本省人保護外省人的情況（戴國輝、葉芸芸 1992: 209-231）。但是，不論是當時的新聞報導或是事後的回憶與訪談，都顯示出二二八事件並未出現台灣人之間的內部清算與衝突。此外，戰後初期全台警察共計 12,908 人，其中台籍約 5,682 人，由於人力不足，大部分以試用警察身分獲得留用。這些台籍警察在戰後初期一度與日警同樣「被視為不受欢迎人物」，然而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台籍警察並未成為群眾的攻擊目標，而選擇「自動封存武器或棄械逃散，或回家觀望」，有些刑警甚至留在工作崗位，如王玉雲、鄭明發、洪天生、吳基員等。反之，「外省警察全都離開崗位，有不少人躲到要塞」（許雪姬、方惠芳 1995: 38）。監察使楊亮功與監察委員

19 正如同萬毓澤（2025: 57）所言：「解殖關注的是殖民性（coloniality）的問題：殖民統治即使形式上已結束，仍有諸多與殖民體制或殖民經驗密切相關的權力關係深植於前殖民地的社會結構、知識體系、身體規訓與感知模式。」

何漢文的《二二八事變調查報告》則指出，群眾進攻警局，台籍警員不僅未予以鎮壓反而「公然參加暴動以致地方當局不惟無可用之保安警力且反成贅累」、「此次事變本省警察不但未能維持治安且助長禍亂」（陳純瑩 1993: 32-46；魏永竹 1992: 125-126, 138）。

戰後初期部分農民因為國營事業撤佃與台籍地主調整地租或撤佃而起身抗爭，方式包括體制內告官與體制外的日常抵抗和集體暴力。不過這些衝突大多維持小規模，並未形成廣泛參與以及跨地域的農民集體抗爭（林傳凱 2018: 399-400）。簡吉與張志忠試圖利用過去農民組合的人際網絡吸收佃農，以重分配土地為號召鼓吹農民武裝起義，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兩人組成自治聯軍，搶奪警察武器並在中部山區從事游擊戰（Tsai 2015 / 黃中憲譯 2017: 287-291）。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很少是農民，原因在於戰後初期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獲得些許利益，缺乏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強烈動機。就組織而言，張行、簡吉、陳啟瑞等人於戰後成立台灣農民協會並擔任幹部，並於 1945 年 10 月之後先後成立潮州分會與東石分會。然而 1945 年 11 月遭到解散之後並未重新建立組織（何義麟 2008: 623）。楊亮功在《「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當中指出九種類型的參與者，其中少有勞工、未有農民，「工廠及交通電信機關之工人，各機關之本省籍公務員，亦有少數參加者。惟全省農民，則均持安靜之旁觀態度」（魏永竹 1992: 133）。戴國輝根據自身目擊與事後研究，大致同意楊亮功的論點。二二八事件的抗議行動是以都市青年與學生作為核心，與農民權益沒有直接關係，農民並未積極參與集體抗議，而地主階級也都處於觀望態度，大多坐等抗議結束能帶來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其次就工人而言，雖然殖民時期的工會會員曾於 1945 年 10 月組織「台灣總工會籌備會」，但是戰爭期間工廠遭受美軍轟炸、日本技術人員遣返離台、政府接收過程混亂，因而工業運作停滯、工人普遍失業，工會組織運動也就難以發展（戴國輝、葉芸芸 1992: 19-20）。農民與工人低度參與二二八抗爭，也帶來台灣地主與資本家未遭到針對的現象，與朝鮮情況截然不同。

（三）相關研究

前述戰後初期歷史情境的明顯差異刺激我思考：為什麼戰後朝鮮如同全球各地在解殖過程中充滿暴力，但是台灣卻似乎作為異例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況？此經驗發現與謎題應該是值得學界注意，有待未來深入研究的課題。以下針對戰後初期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回顧。

韓國史學界從殖民時期白南雲開創社會經濟史傳統，戰後由金容燮、姜萬吉的民眾史學論加以承繼，關注朝鮮晚期以降的長期社會結構與階級形構，成為影響深遠的研究典範（朴仁鎬 2012: 180-181, 195-197）。晚近韓國的歷史社會學者김동노與강진연基於上述研究典範，結合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對於社會結構如何形塑政治變遷提出一系列重要論點。例如，他們考察朝鮮農民運動的長期發展，指出朝鮮王朝時期農民主要對抗的是國家，但是到了日本殖民時期農民卻是對抗地主。這是因為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以及稅收制度破壞了農民與地主的共同體，使得農民重新編排認同邊界以對抗日益擴大的地主與市場經濟剝削（김동노 2007: 213-214; Kim Dong-No 2013）。1920年代殖民政府提高稻米產量以增加稻米出口，導致大地主獲益但中小地主與佃農生活困苦，兩者之間的衝突加深。此後佃農進行組織以捍衛自身權益，並認為朝鮮「惡地主」比日本殖民者更加惡劣。殖民統治加深朝鮮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內部衝突，而殖民者則作為調解者的角色處理農村糾紛（Kang 2015）。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社會後果，朝鮮知識分子引進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建構出不同內涵的民族論述，並形成民族改良主義與左翼民族主義者的不同陣營。雙方在1920年代曾經結盟抗日，但是1930年代以降相互攻訐，甚至重新界定「誰是我們」並將對方排除於共同體之外（Kang 2016; 강진연 2017）。這樣的論述建構延續至戰後，左派推動政治與經濟改革並排斥過去的殖民協力者，美軍政卻又與協力者合作，最終使得朝鮮民族內部分裂更加嚴重（Kang 2017: 284-285），因此在美國佔領時期爆發的大邱事件，群眾抗爭的目標不是外來的美軍政，而是同為朝鮮人的警察、官僚與地主（Kang 2011）。

整體而言，韓國研究學界普遍認為殖民時期的地租與階級分析是了解戰後政治事件不可或缺的基礎（Sorensen 1990）。相較於此，台灣學界對於戰後初期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特定行動者與政治事件，例如，許雪姬（2008）〈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利用林獻堂、吳新榮、黃旺成、黃繼圖、吳鴻麒等人的日記，重現 1945 年 8 月 15 日前後，幾位行動者的思考與行動。蘇瑤崇（2007）〈「終戰」到「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描述戰後初期穩定、平靜、並未動盪不安的社會氛圍。陳翠蓮（2016）〈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指出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歷史清算工作，包括：報復行動，批判日治協力者，重新評價左右翼的抗日運動，保存台灣語言、文化、史料，確立台灣主體性等面向。

台灣研究者對於戰後初期政治史的討論聚焦在事件與行動面向，敘述特定行動者在戰後時空的作為，並未將政治事件與行動置放在長期社會經濟史的結構中進行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歷史學者的描述加以問題化：為什麼台灣菁英在戰後並未嘗試挑戰總督府的權力，一直以謹慎與明哲保身作為最高原則？為什麼台灣在戰後初期並未如同其他殖民地一樣充滿流血衝突，也未出現針對協力者的暴力清算？參酌韓國學界結合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的研究取徑，將有助於回答上述問題。

三、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說

Osterhammel 與 Jansen 指出解殖歷程可以從晚期殖民的特徵、外部條件、解殖進行過程等關鍵面向進行探究。殖民晚期的特徵包括殖民地類型、殖民地的階級結構、殖民統治與警察管理的強度等；外部條件包括鄰近地區解殖過程的影響、第三方施壓、殖民利益集團對殖民母國政治體系的影響力等；解殖進行過程包括解放運動與殖民國家是否動用武力、是否爆發種族或宗教衝突等（Osterhammel and Jansen

2013 / 傅熙理譯 2019: 31-34)。

上述觀點頗具啟發性，本文梳理台灣與朝鮮解殖暴力的歷史脈絡也發現類似因素有待深入探究。首先是戰前的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其次是戰後的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

(一) 戰前因素：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

日本帝國投降之後佔領軍尚未抵達之前，朝鮮半島各地就已經出現許多針對殖民者與協力者的暴力行動，而同時期的台灣則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日本帝國在朝鮮與台灣的殖民統治型態是否存在差異，值得進一步探究。我認為可能成立的因果解釋為：如果殖民統治帶來嚴重經濟壓迫並高度吸納協力者進入體制，使得殖民地社會存在深刻的社會矛盾，則帝國瓦解之際就可能出現自發性的解殖暴力。

1. 經濟壓迫

基於上述因果解釋，我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朝鮮比台灣遭受更嚴重的經濟壓迫，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未來需要研究的議題至少包括以下幾項：土地調查是否成為階級分化的不同路徑，農業發展政策分配效應是否影響農民運動的激進程度，大量貧窮農民是否成為工業發展的產業後備軍，使得勞工階級形成，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

日本、韓國、台灣學界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豐碩，呈現出日本殖民時期朝鮮與台灣經濟條件大不相同，朝鮮農民遭到嚴重剝削而台灣農民生活卻持續改善。朝鮮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使得移居朝鮮的日本大地主獲得大規模土地，朝鮮自耕農與佃農的土地則遭到掠奪。佃農的比例從 1916 年的 36.8% 遽增為 1932 年 52.7%。產米增殖計畫（산미증식계획）當中的水利組合又使得農民承擔高額地租與稅金。殖民地農業政策使得朝鮮農民喪失土地，離開農村進入山林成為火田民或是在城市淪為乞丐。1928 年朝鮮約有 120 萬火田民，1931 年則有 16 萬乞丐。此外，有大量人口移居滿洲作為佃農，1930 年代每年

另有 10 萬人流落日本作為低薪雜工（강만길 1987, 2015: 152-171；조석근 2003）。許多貧農遷徙至日本帝國大規模投資重化工業與海運建設的咸鏡道，成為工廠勞工或碼頭工人，在勞動過程中接觸社會主義思想，日後回到家鄉促使地區農民組合逐漸走向革命化（이세진 2020: 105-133）。1930 年代後期戰時體制下，大量日本資本湧入朝鮮，總督府也興建大型工業設施，朝鮮工業產值比重迅速上升，而重化工業是其中發展最快的部門。1936 年有 59 萬朝鮮人受雇於工業部門，到了 1943 年甚至高達 132 萬勞動大軍（Cumings 1997 / 黃中憲譯 2022: 208）。

台灣農村情況則相當不同。首先，台灣總督府實施土地調查並引進現代土地所有權制度，並未如同矢內原忠雄所言導致農民的無產化，反倒阻礙日本資本併購土地，因為「保護土地私有權的法律體制一旦建立，日本農業資本家即難以使用市場交易以外的手段，甚或赤裸裸的暴力，驅離農民，建立大栽植農場」（柯志明 2006: 88-97）。其次，1930 年代蓬萊米快速擴張是農民生活水準改善最快的時期（張素梅、葉淑貞 2001: 438-439）。從消費支出與工資的統計資料來看，雖然同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的生活水準卻始終比朝鮮更高。由於台灣農村相對富裕，降低農民離鄉背井成為工人的誘因，連帶使得日本企業難以招募勞工（大友昌子 2012: 405）。²⁰堀內義隆（2012）指出雖然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就已經有工業存在，但大部分是農村零細工業，農村工業（例如：罐頭、製糖、煉瓦、製茶、製帽等）從業人員大多屬於臨時雇工（薛化元 2014: 100-101），勞動者都是在農閒的時候兼差，本質上還是農民。這種農村零細工業與都市中的大工廠不同，工人之間難以形成連帶與階級意識。

20 經濟學者亦透過詳細的統計資料指出，日治初期即出現經濟成長，使得台灣人更為健康，壽命延長。此外，由於營養淨值改善，日治初期出生的台灣人相比清末出生者，身高高出二至三公分（魏凱立 2000）。

2. 政治吸納

在此我提出第二個假設：「朝鮮比台灣存在更多且更高層級的協力者，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這個研究假說至少需要探討殖民體制當中高層政治菁英、地方行政官僚、警察等面向。需要研究的課題包括：總督府吸納與再生產殖民地菁英的具體機制，地方行政官僚與警察的本地人比例與職權範圍，殖民地社會對協力者的觀感等主題。

既有研究指出朝鮮總督府官僚制度在初期沿用大韓帝國的組織模式，設立內務部、農工商部、司法部，後於 1919 年將部降格為局，部分親日派朝鮮人曾任局長職位。日本在殖民初期即意圖透過拉攏既有的權力結構，使其統治至少在表面上合法化，並藉由吸納朝鮮人參與行政來確保更平穩的過渡，進而減緩立即且廣泛的抵抗（原智弘 2013: 127-128；박은경 1999）。此外，朝鮮總督府的教育體系創造出許多在殖民體制當中流動與晉升的朝鮮菁英。京城帝國大學雖然日本學生占多數，但是朝鮮學生亦有四成（Abe 1971; Lee 2002; 이혜영 1997）。官僚與教育制度之外，警察體系同樣納入大量朝鮮人參與。相較於台灣只有 15% 的台籍警察（李幸真 2009: 5），殖民地朝鮮參與警察行政的本地人明顯更多，1910 年高達 57.6% 是朝鮮籍，總人數為 4,440 人，1919 年比例下降到 50.3%，總人數則上升到 8,500 人（Chen 1984: 224-225; Grajdanzev 1944: 256-257）。此外，朝鮮人得以擔任警務官、警視、巡查等高階職務，他們加入憲兵警察制度，配合殖民政府鎮壓全國性的反抗運動（姜萬吉 1997: 8）。

（二）戰後因素：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

日本戰敗投降後，蘇聯、美國、中國軍隊分別進駐朝鮮半島北部、南部與台灣，在此之後解殖過程除了戰前因素又疊加上戰後因素的影響。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如何影響朝鮮半島與台灣的解殖暴力，

亦是必須處理的研究課題。²¹ 我認為可能的因果解釋為：如果戰後新政權積極清算協力者，或是相反地高度仰賴協力者進行統治，都可能帶來嚴重的解殖暴力。²² 基於此因果解釋，我提出研究假設：「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未如朝鮮北部的蘇聯佔領軍積極清算協力者，也未如朝鮮南部的美軍政高度仰賴協力者，因此台灣解殖暴力程度低於朝鮮半島」。

加藤聖文（2020）研究日本帝國瓦解之後各殖民地與佔領區（滿洲、朝鮮、樺太、中國、台灣）的解殖與遣返過程，指出「現地定着」方針、佔領軍的性質與政策、地緣政治背景，使得各地的海外日本人面臨不同程度與類型的暴力情境。日本政府戰敗初期即要求海外日本人盡可能留在原地，海外日本人被迫在各地新政權與佔領軍的支配下自謀生路。蘇聯在滿洲、朝鮮北部、樺太等地的戰略目標是掠奪資源並建立地緣政治影響力，這樣的戰略目標加上蘇聯敗壞的軍紀，使得滿洲、朝鮮北部等蘇聯佔領區的海外日本人面臨極端暴力。美國在朝鮮南部的方針是維持穩定以及有序過渡，其地緣政治目標是遏止共產主義而非擴張與掠奪資源，使得在朝鮮南部的日本人，相對於蘇聯佔領區的日本人，得以處於更為平穩的環境以及有組織的遣返過程。蔣介石為了爭取國際支持並集中力量對抗中共，則決定採取「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留用日本資源與人員而不採取報復行動，再加上美國介入協助遣返，因此在中國本土與台灣的日本人在戰後初期和遣返過程都未遭受嚴重暴力。

此外，政權建構過程對於解殖暴力亦有直接影響。蘇聯進入朝鮮北部後支持曾經在滿洲進行抗日游擊戰的左翼共產黨人，這些左翼人士基於意識形態、個人恩怨、奪取權力等動機對於協力者展開清算與

21 感謝審查人提醒這個思考角度並推薦研讀加藤聖文《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大日本帝國」》一書，讓我得以從更全面的角度分析影響解殖暴力情況差異的可能解釋。

22 審查人質疑「日本殖民主義對各地戰後統治方針與結構的影響是什麼」，我認為戰後運用原協力者的方式與殖民經驗息息相關，運用原協力者建構政權帶來的社會後果，亦完全深植於殖民性的權力關係。

報復，並且迅速展開土地改革沒收日本人與協力者的土地（Gray and Lee 2021: 46-54; Cumings 1981: 414; Kim Suzy 2013: 71-104）。朝鮮北部左翼政權不僅默許民間自發報復協力者，更視為一種能夠加以利用的社會力量，試圖將群眾的復仇渴望轉化為社會革命與鞏固國家權力的工具。相對於此，美軍政選擇扶植過去的殖民協力者，留用曾經任職於朝鮮總督府的官僚與警察，而李承晚亦與韓國民主黨（簡稱韓民黨）結盟以維繫自身權力基礎，韓民黨由地主與商人組成，傾向維持既有社會與政治統治結構（Buzo 2023: 89-99; Cumings 1981: 151-163）。這樣的政權建構過程使得朝鮮南部的解殖暴力程度在戰後初期低於朝鮮北部。

四、結論

本文的目標並非提供定論，而是透過對戰後初期台灣與朝鮮解殖歷程的經驗比較，揭示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謎題，並為未來研究勾勒出分析框架。此謎題的核心在於：為何在全球解殖浪潮普遍伴隨著暴力衝突的背景下，朝鮮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後，立即爆發了針對殖民者與本地協力者的大規模、殘酷的集體暴力；而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卻在同一時期呈現出相對和平、秩序井然的「政治真空」狀態，其內部清算僅止於言詞批判，而未演變為流血衝突？本文嘗試系統性地呈現此經驗差異，並提出一套涵蓋戰前結構因素與戰後情勢因素的整合性解釋假說，藉此呼籲學界重視此議題，並投入更為細緻的實證研究。

本文首先確立了研究的經驗基礎，即台灣與朝鮮兩地在解殖初期截然不同的暴力狀態。在朝鮮，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瞬間，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便如火山般噴發，民眾自發性地攻擊警察局、焚燒神社，暴力不僅針對日本殖民者，更猛烈地指向被視為「民族叛徒」的本地協力者。這些協力者涵蓋了親日地主、協助日本動員的地方仕紳，以及在基層執行壓迫政策的朝鮮警察。這股暴力浪潮並未隨著時間推移

而平息，反而在美軍政佔領朝鮮南部後，由於政策失當、經濟動盪，以及大量留用曾為日本人服務的官僚與警察，引發了更深層的社會怨恨。1946 年的大邱事件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儘管起因包含對美軍政政策的不滿，但群眾的主要攻擊目標並非美軍，而是那些繼續壓迫人民的朝鮮警察與官員。目擊者描述群眾的暴行極為殘酷，包括將警察虐待至死、剝皮、活埋等，其背後是源自殖民時代長期積累的深刻仇恨。

戰後台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從日本投降到國民政府正式接收的七十一天裡，台灣社會出奇地平靜。日本總督府依然有效維持著社會秩序，甚至婉拒了林獻堂等台灣菁英主動提出協助維持治安的提議。在台日本人普遍感到安全，遣返過程也相對和平，甚至出現台灣人送別的場景。台灣菁英，無論是林獻堂這樣的傳統領袖，或是黃旺成等知識分子，都表現出極度的謹慎與自持，避免任何可能引發動亂的「輕舉妄動」。謝雪紅、楊逵等左翼人士雖試圖組織群眾，但影響力有限，未能掀起大規模的清算鬥爭。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對協力者的清算，主要停留在言論和道德層面。報章雜誌上充斥著對「御用紳士」的批判，要求他們退出政治舞台，反省過錯。然而，這些批判並未轉化為實際的暴力行動。吳濁流以「政治真空」形容此時期的和平與自治狀態，而晚近研究也證實，總督府的治理能力直到政權移交前都未崩潰。即便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其暴力性質也與朝鮮的內部清算截然不同。二二八事件的衝突主要發生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是對新政權治理失敗的反應。在事件中，曾為日本人服務的台籍警察並未成為群眾的攻擊目標，反而多選擇逃避或觀望，甚至有加入抗爭的情況。同樣地，台籍地主與資本家沒有成為農民或工人的鬥爭對象，這與朝鮮佃農追打地主、群眾攻擊親日派的情勢大相逕庭。

面對上述顯著差異，本文提出了包含戰前因素與戰後因素的雙重分析框架，並在其中各自發展出可供未來研究檢驗的具體假說。「戰前因素：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的核心論點是，不同的殖民統治模式

會塑造出不同的社會結構與內部矛盾，從而決定了解殖瞬間暴力發生的可能性與強度。第一個待驗證的假說是關於經濟壓迫的程度：「朝鮮比台灣遭受更嚴重的經濟壓迫，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本文彙整的文獻指出，日本在朝鮮實施的土地調查與農業政策，導致大量自耕農與佃農失去土地，佃農比例急遽攀升，農村社會普遍貧困化，產生了龐大的「火田民」、乞丐，以及流向滿洲和日本本土的低薪勞工。同時，朝鮮北部的重化工業發展，也催生出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工人階級，加劇了社會的階級對立。反觀台灣，總督府的土地政策在客觀上保護了土地私有權，阻礙了日本資本的大規模兼并；而蓬萊米改良等農業發展，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準，使得台灣農村相對富裕。加上台灣的工業多為農村零細工業，勞動者本質上仍是農民，難以形成獨立的、具有強烈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未來研究應更系統性地量化比較兩地農民的土地持有狀況、實質收入、消費結構，以及勞工階級的形成規模與組織程度，以驗證此假說。

第二個待驗證的假說是關於政治吸納的模式：「朝鮮比台灣存在更多且更高層級的協力者，因此戰後解殖暴力更為嚴重」。初步文獻彙整顯示，朝鮮總督府在統治初期便大量吸納朝鮮人進入官僚體系。更關鍵的是，在作為殖民統治最直接象徵的警察體系中，朝鮮警察的比例遠高於台灣且能晉升至高階警官。這個龐大且深入社會各個角落的協力者群體，成為殖民壓迫的直接執行者，自然也在解殖時承受了最直接的報復。相較之下，台灣的協力者結構可能層級較低、權力較小，或在社會中的可見度與引發的仇恨程度不如朝鮮。未來研究需深入比較兩地殖民政府中，本地菁英在行政、警察、司法等部門的參與比例、職權高低及晉升管道，並探討社會大眾對這些協力者的觀感與態度。

「戰後因素：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的核心論點在於戰後佔領軍的性質與新政權的建構策略，與殖民遺緒共同作用而形塑解殖暴力的樣貌。對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說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未如朝

鮮北部的蘇聯佔領軍積極清算協力者，也未如朝鮮南部的美軍政高度仰賴協力者，因此台灣解殖暴力程度低於朝鮮半島」。美國與蘇聯以三八線分割佔領朝鮮半島，創造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態。在北方，蘇聯支持金日成等具有抗日游擊戰背景的左翼共產黨人，他們將清算親日派與土地改革結合，不僅默許甚至利用民間的復仇渴望，將其轉化為鞏固權力的社會革命。在南方，美軍為求穩定並防堵共產主義，選擇扶植並大量留用殖民時期的官僚與警察，並與地主、商人階級為主的右派菁英結盟。這種作法等於是將人民怨恨的對象重新安插在權力位置上，無異於火上澆油，導致民間的清算怒火持續燃燒，並最終以反抗新體制的形式爆發。

反觀台灣，蔣介石當時為爭取國際支持並集中力量應對國共內戰，對日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傾向留用日本技術人員與資源，而非進行報復性清算，使得在台日本人免遭大規模暴力。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帶來了自己一整套的統治班底，雖然也任用部分台籍菁英，但其權力結構的建立邏輯，並非像美軍在朝鮮南部那樣，直接且全面地繼承並依賴殖民時期的協力者網絡。因此，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未被新政權的政策所激化，衝突的焦點迅速從「清算舊時代協力者」轉移到「對抗新來統治者」。未來的研究應細緻比較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蘇聯民政廳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初期的人事政策、對舊協力者的態度（清算、留用或邊緣化），以及這些政策如何與當地社會既有的矛盾產生互動。

總而言之，本文提出具有研究潛力的核心議題，並提供多層次的因果分析框架。我認為要解開台灣與朝鮮解殖暴力差異之謎，不能僅僅停留在單一事件或單一因素的描述，而必須將戰前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吸納模式，與戰後的地緣政治格局、政權建構策略進行分析。這項研究不僅能深化我們對台灣與韓國現代史的理解，更名為全球範圍內的解殖研究提供來自東亞的案例與理論貢獻。

誌謝：本文發展自作者博士論文計畫書，撰寫期間承蒙蕭新煌、林國明兩位教授悉心指導。文章初稿發表於 2024 年「解殖、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工作坊，獲與會學者多方建議。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會提出詳盡指正與建設性意見，協助本文大幅修正論點並釐清架構。作者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大友昌子，2012，〈1921 年至 1933 年台灣殖民地社會事業的二重構造與貧民救助事業的擴大〉，曾妙慧譯。頁 371-472，收入薛化元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台灣社會史研究文集》。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加藤聖文，2020，《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大日本帝国」》。岩波書店。
- 朴仁鎬，2012，《韓國史學史》，全瑩等譯。香港亞洲出版社。
- 何義麟，2008，〈台灣人民協會〉。頁 585，收入張炎憲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國史館。
- 吳新榮，1989，《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台灣人家族史》。前衛。
- 吳叡人，2016a，〈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頁 23-82，收入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6b，《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衛城。
- 吳濁流，1988a，《無花果：台灣七十年的回想》。前衛。
- ，1988b，《台灣連翹》。前衛。
- 李幸真，2009，《日治初期台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召訓（1898-1906）》。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正慧，2008，〈李喬松〉。頁 171-172，收入張炎憲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國史館。
- 林孝庭，2015，《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聯經。
- 林傳凱，2018，《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1945-1955）》。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獻堂，2010，《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 年》，許雪姬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近藤正己，2014，《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下）》，林詩庭譯。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阿部賢介，2013，《關鍵的七十一：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之動向》。國史館。
- 姜萬吉，1997，《韓國現代史》，陳文壽、金英姬、金學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柯志明，2006，《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群學。
- 原智弘，2013，〈1910年代朝鮮人文官の任用制度〉。《帝京大学外国語外国文化》6: 127-167。
- 堀內義隆，2012，〈殖民地時期台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李為楨譯。頁265-314，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張炎憲等，2006，《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張素梅、葉淑貞，2001，〈日治時代台灣農家之消費結構〉。《經濟論文叢刊》29(4): 411-456。
- 曹中屏等，2005，《當代韓國史（1945-2000）》。南開大學。
- 許芳庭，2008，〈林兌〉。頁222-223，收入張炎憲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國史館。
- 許雪姬，2008，〈台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台灣文學學報》13: 151-178。
-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毓良，2018，《台灣在民國：1945-1949年中國大陸期刊與雜誌的台灣報導》。前衛。
- 陳純瑩，1993，〈光復初期台灣警政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為中心的探討〉。頁21-78，收入賴澤涵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陳翠蓮，1995，《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時報。
- ，2013，《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自治的夢想》。衛城。
- ，2016，〈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台大歷史學報》58: 195-248。
- 森田芳夫，1964，《朝鮮終戰の記録：米ソ兩軍の進駐と日本人の引揚》。巖南堂書店。
- 費德廉，2004，〈解讀數據：殖民地台灣的族群性、暴力與戰時動員〉。頁349-386，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播種者。
- 塩見俊二，2001，《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文英堂。
- 萬毓澤，2025，〈解殖的多重路徑：專題導論〉。《台灣社會學》49: 57-62。
- 歐素瑛，2003，〈戰後初期在台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3: 201-

- 227。
- 戴國輝、葉芸芸，1992，《愛憎 2,28——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遠流。
- 薛化元，2014，〈日治時期台灣殖民經濟發展解釋架構的一個考察：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為中心（1895-1945）〉。《台灣風物》64(4): 74-110。
- 魏永竹編，1992，《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魏凱立，2000，〈身高與台灣人經濟福利的變化，1854-1910〉。《經濟論文叢刊》28(1): 25-42。
- 蘇瑞鏘、林瓊華，2008，〈謝雪紅〉。頁 716-717，收入張炎憲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國史館。
- 蘇瑤崇，2007，〈「終戰」到「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國史館學術集刊》13: 45-87。
- 강만길，1987，《일제시대 빈민 생활사 연구》（日帝時代貧民生活史研究）。창비。
- ，2015，《고쳐 쓴 한국현대사》（重寫韓國現代史）。창비。
- 강석정，2018，〈미군정기 '서울시헌장'의 재발견 - '지방 - 국민국가 - 동아시아'의 구조와 긴장 -〉（美軍政期「首爾市憲章」的再發現）。《법사학연구》（法史學研究）58: 149-194。
- 강진연，2017，〈식민지 조선의 민족 담론과 사회적 상상〉（殖民地朝鮮的民族論述與社會想像）。《사회와 역사》（社會與歷史）114: 97-130。
- 김동노，2007，〈일제 시대 식민지 근대화와 농민운동의 전환〉（日帝時代殖民地近代化與農民運動的轉向）。《한국사회학》（韓國社會學）41(1): 194-220。
- 김삼용，2015，《몽양 여운형 평전: 진보적 민족주의자》（夢陽呂運亨評傳：進步的民族主義者）。채륜。
- 김승식，1947，《1948 년판 조선년감》（1948 年版朝鮮年鑑）。조선통신사。
- 김형석，2024，《고하 송진우와 민족운동》（古下宋鎮禹與民族運動）。동문선。
- 박은경，1999，《일제하 조선인 관료 연구》（日帝下朝鮮人官僚研究）。학민사。
- 윤덕영，2010，〈8·15 직후 조선건국준비위원회의 조직적 한계와 좌·우 분립의 배경〉（8.15 後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的組織侷限與左右分裂背景）。《사학연구》（史學研究）100: 826-867。
- 이규태，2006，〈해방 직후 건국준비위원회의 활동과 통일국가의 모색〉（解放後建國準備委員會的活動與統一國家的摸索）。《한국근현대사연구》（韓

- 國近現代史研究) 36: 7-46。
- 이세진, 2020, 〈일제강점기 양양농민조합의 혁명화와 그 배경〉(日帝強佔期襄陽農民組合的革命化及其背景)。《한중인문학연구》(韓中人文學研究) 66: 105-133.
- 이연식, 2012, 《조선을 떠나며: 1945년 패전을 맞은 일본인들의 최후》(離開朝鮮: 1945年戰敗日本人的最後), 정순구 옮김. 역사비평사。
- 이혜숙, 1988, 〈미군정기 농민 운동의 성격과 전개 과정〉(美軍政期農民運動의性格與展開過程)。《해방 직후의 민족 문제와 사회 운동》(解放之後的民族問題與社會運動), 한국사회사연구회 편, 229-278 쪽. 문학과 지성사。
- 이혜영, 1997, 《한국 근대 학교교육 100년사 연구(II): 일제시대의 학교교육》(韓國近代學校教育 100年史研究(II): 日帝時代的學校教育)。한국교육개발원。
- 임동석, 2007, 〈‘서울’ (首爾) 名稱淵源考〉。《中國語文學論集》 47: 295-318
- 조석곤, 2003, 《한국 근대 토지제도의 형성》(韓國近代土地制度的形成)。도서출판 해남。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2005, 《민세 안재홍 심층연구》(民世安在鴻深層研究)。황금알。
- Abe, Hiroshi. 1971. “Higher Learning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 Keijō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he ‘People’s University’ Campaig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9 (2): 174-196.
- Alexander, Jeffrey C.,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2004.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tts, Raymond F. 2012. “Decoloniz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ord.” Pp. 23-37 in *Beyond Empire and Nation: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and Asian Societies, 1930s-1970s*, edited by Els Bogaerts and Remco Raben. Brill.
- Brocades Zaalberg, Thijs and Bart Luttikhuis, eds. 2022. *Empire’s Violent End: Comparing Dutch, British, and French Wars of Decolonization, 1945-196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uruma, Ian. 2013.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Penguin Books. 白舜羽譯，2017，《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紅桌文化。
- Buzo, Adrian. 2023.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Routledge.
- Chang, Kornel. 2025. *A Fractured Liberation: Korea under US Occupa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Ching-chih. 1984. "Police and Community Control Systems in the Empire." Pp. 213-239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edited by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ruce. 1981.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1: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W. W. Norton. 黃中憲譯，2022，《朝鮮半島現代史：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左岸。
- Duara, Prasenjit, ed. 2003. *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Routledge.
-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ess.
- Gardinier, David. 1968. "Decolonization." Pp. 268-272 in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Concepts and Issues*, edited by Joseph Dunner. Peter Owen.
- Gayn, Mark. 1989. *Japan Diary*. Tuttle Publishing.
- Gifford, Prosser and Wm. Roger Louis, eds. 1982.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Decolonization 1940-19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rajdanzev, Andrew J. 1944. *Modern Korea*.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Gray, Kevin and Jong-Woon Lee. 2021. *North Kore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g, Jin-Yeon. 2011. "Colonial Legac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Membership in a National Community: The 1946 People's Uprisings in Kore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4(3): 321-354.
- . 2015. "Forging the Colonial State as an Arbiter of Internal Boundaries: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Agrarian Relational Shift in Korea." *Agricultural History* 89(2): 158-185.
- . 2016. "The Dynamics of Nation, State and People: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n Korea." *Interventions* 18(3): 379-403.
- . 2017. "Colonialism and Contested Membership: Shifting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ostcolonial Division in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41(2): 263-289.
- Kebede, Messay. 2001. "The Rehabilitation of Violence and the Violence of Rehabilitation: Fanon and Colonialism."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31(5): 539-562.
- Kim, Dong-No. 2013. "National Identity and Class Interest in the Peasant Movement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Pp. 140-172 in *Colonial Rule and Social Change in Korea, 1910-1945*, edited by Hong Yung Lee, Yong-Chool Ha, and Clark W. Sorense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Kim, Suzy. 2013. *Everyday Life in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kov, Andrei. 2013. *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Jeong-Kyu. 2002.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 Kore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1910-1945)."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10(14).
- 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dayisenga, Zenon. 2022. "Fanon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Using Violence:

- An Inevitable for Both Colon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53(5): 464-484.
- Osterhammel, Jürgen and Jan C. Jansen. 2013. *Dekolonisation: Das Ende der Imperien*. C.H. Beck. 傅熙理譯，2019，〈帝國主義的末日：去殖民的風潮吹過亞洲與非洲，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版圖〉。貓頭鷹。
- Rothermund, Dietmar. 1998. *Delhi, 15. August 1947: Das Ende kolonialer Herrschaf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朱章才譯，2000，〈殖民統治的結束〉。麥田。
- Shin, Gi-Wook. 1994. “The Historical Making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Korean Peasant Uprisings of 194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 1596-1624.
- Sorensen, Clark W. 1990. “Land Tenur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olonial Korea.”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7 (1990): 35-54.
- Spector, Ronald H. 2022. *A Continent Erupts: Decolonization, Civil War, and Massacre in Postwar Asia, 1945-1955*. W.W. Norton & Company.
- Stapleton, Timothy. 2018. *Africa: War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 Thomas, Martin and Pierre Asselin. 2022. “French Decolonisation and Civil War: The Dynamics of Violence in the Early Phases of Anti-colonial War in Vietnam and Algeria, 1940-1956.”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20(4): 513–535.
- Tsai, Shi-Shan Henry. 2015.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Land Reform in Taiwan, 1924-1951*.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黃中憲譯，2017，〈台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聯經。
- Watt, Lori. 2009.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黃煜文譯，2018，〈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遠足文化。